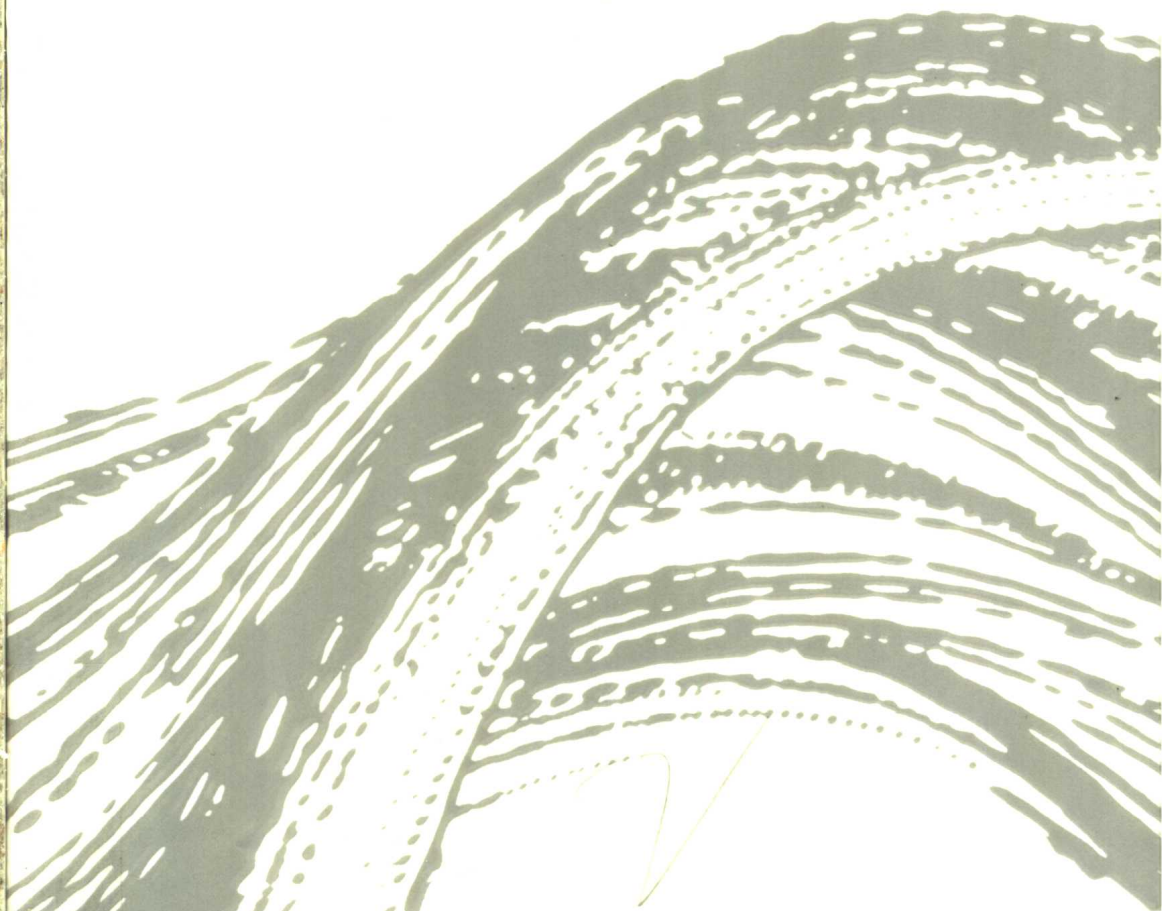


刘小萌

中国知青口述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253
177

刘小萌

中国知青口述史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4394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知青口述史/刘小萌.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1

ISBN 7-5004-4078-2

I. 中… II. 刘… III.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国—史料
IV. D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0403 号

责任编辑 郭沂纹
责任校对 易小放 李小冰
封面设计 李颖明
版式设计 李勤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1201 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9.125 插 页

字 数 532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3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京大学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

费孝通 题

中国
知青口述史

目 录

序言	1
导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概述	15
“我这个人喜欢新鲜”	张 韧 口述 22
“奋斗、求索,始终是这代人的主题曲”	曲 折 口述 56
迟到的婚纱	张 玲 口述 125
一场大火改变了我的人生	小 月 口述 158
在坎坷中重塑人生	刘继业 口述 199
“我想用这个证明,我没有倒下”	吴献忠 口述 218
坎坷人生路,拳拳赤子心	柴春泽 口述 234
“我拥有这么丰富精彩的经历,真不枉来人世!”	安海燕 口述 268
不再颤抖的灵魂	郑梦彪 口述 348
版纳知青在行动	丁惠民 口述 390
阿克苏事件始末	欧阳珪 口述 445
“把面子留给母亲,把理智留给自己”	杨清良 口述 506
“中国的事,‘哀兵必胜’”	庄伟亮 口述 530
附录一 本书人物经纬	593
附录二 名词索引	602
附录三 主要参考文献	605
后记	608

序 言

刘小萌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一共有 1700 万以上城市知识青年走向农村、走向边疆。这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对中国的社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这场运动落下帷幕到现在，又是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当初的“知识青年”早已不再年轻，即便如此，他们对人对己，还依旧以“知青”相称。这说明，“知青”一称已超出当初年龄的限定，而成为城市中有过山下乡经历的一代人的专称。

知青返城以后，实现了社会角色的转换，融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但同时还保留着许多有形无形的联系。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大批知青内退、下岗而成为新时期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知青”问题重新凸显出来，“知青”意识也有抬头和蔓延的趋势。即便已霜染双鬓，即便是陌路相逢，一句“知青”，就足以产生心灵上的沟通。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青”仍是一个在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称谓。在过去的一年里，在做知青口述史的过程中，我对知青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又有了新的认识。

一 〈中国知青口述史〉的缘起

曾有朋友问我：现在人类学家和研究妇女史的一些学者使用口述这种方法，是假定他们研究的对象没有文化，不能写字，需要一些学者帮助他们去记录他们的声音。可是知青的情况不同，他们是有知识

有文化的，那么，你在对知青史的研究中，为什么要选择口述这样一种文体？

我说，这个问题问得好。当年中断了学业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许多人充其量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水平，他们尽管被冠以“知青”的名号，其实知识少得可怜。不过，我决定以知青为对象做口述史时，着眼点倒并不在于他们知识的有无。过去我做知青史研究，主要是根据文献史料。因为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知青办公室作为国务院的一个行政机构，它在各级政府都有相应分支并存有大量档案和文献，加之相关史料如报刊、书信、回忆录、照片实物等，品类繁多，数量宏富，为在这方面运用传统史学方法开展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写《中国知青史——大潮》，时间截止到1980年，因为上山下乡作为一场官方组织的运动就是在这一年基本落下帷幕的。1998年，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和我的《中国知青史——大潮》一并出版后，本来不想再写下去了，可是后来发现遗留的问题非常多。两年前，一位上海知青给我写了一封信，有一句话说得比较尖锐：“你在书里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结束了’，对你们是结束了，可是对我们这些在困境中挣扎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永远的噩梦。”后来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计划再写一部《中国知青史》的续篇，书名都想好了，就叫《落潮》吧，主要写知青返城20年来的坎坷历程，与前面的《初澜》、《大潮》，不是正好形成比较完整的三部曲嘛！

随即就遇到一个问题，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各地的知青办已经陆续撤销，再没有大量的文献档案可供参考。再者，当年的知青，早已融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关于他们的现状，各级政府基本上没有文献可以参考，因为各级政府已不再把知青作为一个特定的人群。政府部门可以把下岗工人作为关注对象，尽管里面有很多的知青，但是不会把这部分人单独抽出来考察。所以，如果想把这项研究进行下去，就不能不考虑开发新的资料来源，于是我就考虑，在续写知青史之前，是否应该先做一些口述，看看可以搜集到哪些新的资料，也许还会发现一些新的值得关注的问题。



岁月如歌——参加2001年在厦门召开的“老三届知青文化论坛”时的合影（右起：刘小萌、潘平、侯隽、李南、定宜庄、杨健）

当然，这还只是酝酿阶段，真正下决心把这事做起来，还应归功于2001年12月在福建厦门召开的“老三届知青文化论坛”。这个论坛是由厦门知青作家谢春池发起组织的，可以说汇集了与“知青”话题有关的各方面人士——

侯隽在中国知青史上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1962年她从北京良乡高中毕业后，到河北省宝坻县安家落户。那时，城市知青下乡插队还未提上日程。1963年夏，国家开始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长期工作，侯隽因此具有了典型意义。在以后的年代里，她的名字始终跟上山下乡运动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象征。

曲折，堪称“文化大革命”中“下乡”第一人。1967年10月9日，他和另外九名北京“老三届”学生主动要求到内蒙古牧区插队，在他们的身后，1400万知青走向农村和边疆，由此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曲折的命运就像他的名字所寓意的，足够曲折。在经历

官场上的种种蹭蹬之后，他终于在90年代“下了海”。

在那次会上，我还有幸结识了福建晋江安海知青联谊会的代表郑梦彪。这个来自东南沿海文化古镇的汉子，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第九世裔孙，高大的个子，豪爽的谈吐，诙谐的调侃，不过，令我唏嘘不已的，还是他的苦难身世和坎坷经历。

再有上海知青丁惠民，在1978—1979年云南农场知青的请愿罢工活动中，身为总指挥的他，振臂一呼，数万知青云随影从。随着云南农场知青的大返城，他的名字也永远载入了史册。

湖南知青郭晓鸣，这位被戏称为“湖南钢材大王”的企业家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倒不是经营上的如何成功，而是他对“知青事业”的执著。他在长沙办着一个“知青酒家”，赔本赚吆喝，要的就是这“知青”的品牌；他“养”着一个知青合唱团，投入的是金钱和精力，产出的是文化和交情；他积极参与“第二故乡行”，用慷慨的捐献实践“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古训。



长沙知青酒家外景

当时我就想，有这么多知青朋友近在咫尺，是多好的条件，为什么不把口述史做起来呢？感谢谢春池和厦门的“老三届知青文化论坛”，使我找到知青口述史的起点。

二 《中国知青口述史》的内容和特点

关于知青口述史，过去已有一些书籍问世，时间最早的有海外华人学者梁丽芳女士所著《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是书写于20世纪80年代，是在对26个中国年轻作家（其中多数当过知青）的采访基础上写成的学术著作。“从学习雷锋的小学生到戴袖章的红卫兵，从拿锄头的下乡知识青年到失业的返乡青年，26位后毛泽东时期成名的中国作家，畅谈他们的文学道路与‘文化大革命’经历，既是口述历史，也是第一手的史料。”印在扉页的这段话，概括了全书的内容。是书先后有英、日、繁体中文版出版，在海外的影响较大。国内则有王江主编的“口述实录体全景式报告文学”——《劫后辉煌》，田小野主编的《单身女性独白》，刘中陆主编的《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这些书的体例、内容、风格各不相同，或关注于女性，或侧重于作家，或着眼于“劫后的辉煌”——也就是那些成功人士。

本书一共收录13位知青的口述。中国有一千七百万知青，每一个知青的经历，都称得上是一部书，而且内容绝不会重复。应该说，从如此庞大的群体中选出几十个采访对象来，并不是一件难事。问题是，要精益求精，要从典型中再摘出那最典型的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选定的对象，第一类为当年的知青典型，上海的张韧，北京的曲折，内蒙古的柴春泽、安海燕，辽宁的刘继业、吴献忠，他们都是不同时期媒体宣传过的知青样板。尽管他们在起点上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但后来的经历、目前的处境却大相径庭。

张韧，知青中的“大姐”，1962年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但

未上，执意下乡，曾担任省团委书记、县委副书记、省计委商贸处处长……如今正在上海报业集团纪委书记的岗位上站“最后一班岗”。张韧的口头语是“喜欢挑战”，不论是栖身“草野”，还是身居“庙堂”，一直与书籍为伴。所以，她的思维一直很活跃，不愿守成，热衷开拓。

柴春泽，一个极“左”路线猖獗年代的知青典型，在我的《中国知青史——大潮》中，曾无情地将他称为“有写信癖”的人。通过与春泽的交往，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朴实而且循规蹈矩的人，思想上的拘谨可能有一些，但绝对是个好人。工作认真到了极点，每天早到晚退，同时当着许多班的辅导员，被人们看做“活雷锋”。他当年领着知青在玉田皋种的稻子，如今扩大到了数万亩，仍在造福一方。采访增进了我对他的了解，经历、观念、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不再重要，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刘继业、吴献忠都是柴春泽当年“一个战壕的战友”，辽宁的著名知青典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们同遭牢狱之灾。如今的刘继业，已是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中层领导，这里有周围人的宽容与帮助，更有他本人的勤奋与执著。吴献忠至今仍坚守共产主义信念，自称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她最大的一个理想是，将来有机会在沈阳盖一座知青大厦，里面有优质的服务、低廉的价格，有钱的知青来，没有钱的知青也请进来。你可以认为这个理想有点儿离谱，却不能怀疑她的真诚。在一个铜臭熏天的环境里，这样真诚的想法不是很可贵嘛！

安海燕，是另一种类型的知青典型。她脾气温和，柔中有刚。13岁时遭遇“文化大革命”动乱，靠捡破烂养活全家；17岁下乡当赤脚医生，因成绩突出成了典型；80年代，她放弃已有的名利到海南闯天下，如今已是颇有业绩的企业家。

如今，典型的光环早已离他们而去，我之所以仍把他们作为采访对象，是因为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象征，他们的命运浮沉以及近二十年来的奋斗历程，在一代人中依旧令人关注。

第二类采访对象，是知青中的民间领袖，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风起云涌的返城风中脱颖而出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有云南农场知青丁惠民、新疆农场知青欧阳琰。欧阳琰，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当他穿着那身褪色的劳动布工装、踽踽独行在繁华的南京路上时，你绝不会想到，当年，为了新疆兵团几万上海知青的命运，他曾抱定必死的决心。“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为了这，他吃尽了苦头；为了这，他也博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敬重。我还采访了王良德——1979年春新疆上海知青北京上访团的负责人，他的回忆，为还原那段历史补充了宝贵的资料。另外，我把20世纪80年代中叶在北京等地进行请愿上访的核心人物之一庄伟亮也列为采访对象。他不是那种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而是特殊时期一个知青群体的优秀代表。这些来自民间的知青，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焕发过夺目的光彩，一旦大潮退去，他们又回落民间，归于平凡。但不管怎么说，在中国知青史上，永远有他们不可磨灭的篇章。

第三类采访对象，是一些默默无闻的普通知青。说他们普通，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与大多数知青如出一辙，下乡、返城、下岗（或退休），演绎了同样的人生三部曲。但他们的经历又是典型的，在他们的种种坎坷、苦难、磨砺中，浓缩着不止一代人的生命体验。张玲，一位普普通通的女人，用她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话语，讲述了一段足以打动心的故事：两次结婚，第一次嫁给一个农民；回到北京后，“偌大的北京城，竟没有她放一张床的地方……”第二次结婚，知青们为她举办了一个足够风光的婚礼。在《婚礼进行曲》的伴奏下，年过半百的她第一次披上了婚纱。对过去的经历，她从不怨天尤人，思维是内省式的，“不管多么困难，也要履行好做妻子、做母亲的责任”。还有小月，一位在东北兵团为扑灭山火而被毁容的女人。她在花季的年岁，突遭狂风骤雨的摧残，从此与“幸福”二字绝缘。她叙说了毁容后的痛苦，也叙说了冷漠和歧视带来的伤害。

我所采访的以上几类知青，家庭出身、文化背景、人生遭际、政治观念各不相同，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和感受都带有极鲜明的个人

色彩，因此，他们的表述都极具个性。对上山下乡运动肯定也罢，否定也罢，对那个时期的政策感激也罢，诅咒也罢，在本书中，都得到如实的反映。社会在前进，人们对历史的回顾不能不带有今天的烙印，但社会的发展也带来日益多元的观念与需求，已不能强求人们认识一律。本书希望紧紧围绕这些典型人物的回忆，对那场运动和掩身其后的社会大背景，加以多角度的深度再现。

按照口述的要求，我的工作分为几个步骤。第一步，采访录音。先根据对象拟定采访大纲，进行实地采访。这项工作从2002年1月启动，到年底基本完成。将近12个月里，足迹所及，包括上海、泉州、厦门、福州、沈阳、桂林、广州、昆明、赤峰、长沙、武汉、大连，有些地方还去了两次，采访知青近三十人。

第二步，将录音整理成文字。这是一项费时费力有时又很单调的工作。在这里，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妹妹刘小苗女士，因为所有录音的初步整理工作都是由她完成的。我所采访的知青，分散各地，说话南腔北调，声调有高有低，给整理带来很大难度。然而，经过她的辛勤劳动，风格迥异的话语都变成了一行行清新隽美的文字。小苗15岁就在“工宣队”的强制下到延安安塞插队，新挖的窑洞还没搬进去，窑洞就塌了，如果没有那个“万幸”，后果可想而知。后来，她转回老家，又进工厂，一直在外地，直到47岁提前“内退”。可以说，她与千千万万“下岗”、“内退”的女知青们，有着相同或类似的命运。我完全明白，她不辞劳苦地为我整理资料，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她也是知青。

录音形成文字后，我再核对一遍，形成口述的原始稿。因为受访者的文化水平、表述能力相差很大，叙述重复、时间倒置、记忆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所以这一步的工作，就是在尽量保证口述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对它做必要的整理，包括：文字上的修改和次序上的调整；史实的核实和简单注释；对全文作分段处理，加小标题和提要；为了阅读的便利，还删去了访谈时的全部问话和插话。这样，就形成了初步修订稿。全部整理工作，均有保留的录音带作为原始依据。

第四步，把初步修订稿与本人核实，做必要的补充修改，撰写采访前记，在此基础上形成定稿。

本书收入口述 13 篇，只是全部口述的一部分。部分口述没有收入，有多方面原因，一个是有关 1966 年夏秋之际北京赴疆支边青年的口述，他们的情况比较特殊，反映的问题也比较尖锐，我准备单独结集出版；第二，有些稿子不够理想，尚有待补充；另外，个别受访者身份比较敏感，或涉及个人隐私，或新遭不幸。凡属于这些情况的，我都决定暂不发表。

我的采访，采取了多样的形式。对知青典型，一般是请他们围绕上山下乡运动讲述自己的经历；对民间知青领袖，请他们围绕重大事件做专题性口述；对一些普通的知青，考虑到他们一生的坎坷多与幼年的家境特别是家庭出身有直接联系，近年的境遇又最值得关注，所以，对他们的采访大多采取生命史的形式，即从幼年的记忆开始，直到现在。



与上海的“新疆人”座谈

做口述史是人与人、而且通常是与陌生人交往的过程。一般说来，对一个陌生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乃至隐私，即便不是那种生性内向、拘谨的人，恐怕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的采访却很少尴尬，开场白也是直来直去，省去了许多俗套和应酬。为什么这么简单？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都是知青，彼此有基本的认同。在上海采访，一些从新疆兵团回来的老知青对我发问：“你觉得上海人怎么样？”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我既不愿撒谎又不愿直言，只好敷衍说：“我老婆是上海人，可是我跟上海人不怎么交往。”话音未落，没想到他们齐声赞同：“你这话说对了！”他们说：“上海人不把我们看做上海人，管我们叫‘新疆人’。我们跟他们也不是一路的。”这些知青在跟我谈话过程中始终自称“新疆人”，因为他们有新疆的长期经历，返城（不少人还属于“非法倒流”的）后多数处境不佳，沦为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颇受一些人的白眼。但他们的行为方式跟李伯重先生所论的那种上海“小男人”完全是两回事，非常豪爽，非常真诚，非常好客，跟北方人真是没有什么区别。我第一次去上海采访时，还没有课题经费资助，就住在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上海知青家里，三口人两间房，住的条件差了一点，可是他们一家人盛情相邀，非让住在他家，每天就像贵宾似的供着我，那种真挚的情感让我特别感动。

三 口述的价值与局限

通过口述还原历史，在海内外都不是什么稀罕事，而且有愈来愈热的趋势。所以我想结合做知青口述史的心得，对口述的价值与局限略作说明。

关于口述史的缘起，有学者说那是由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衍生出来的方法。也有学者明言，孔子著《春秋》，将时间上限断在唐尧虞舜，那一段远古的历史只能得自传闻，也就是口述；司马迁《史记》记荆轲刺秦王、秦国灭魏国等史事，也都利用了口述史料。所以，口述史不是什么舶来品，而是地道的国粹。其实，口述史作为历

史学的最早形式，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外国，都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根本没有必要厚此薄彼。近些年来，口述史在人类学、史学、妇女学乃至文学等领域都推出了不少成功之作，已是不争的事实。^①

口述方法之于知青史研究，究竟有哪些价值？

首先，它给研究开拓了新领域，扩大了新视野，补充了新资料。它使少数人把持的史学从象牙之塔中走出来，接近民众，接近现实，把握时代的脉搏。历朝历代的历史包括文献档案史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除极少数“漏网之鱼”的野史稗官者言，主要是由统治者来写的，代表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意志，而真正来自民间的话语则几乎被忽略或者窒息。口述方法，使普通百姓参与了历史的创作，使人们在领教雷霆万钧的主旋律之余，还能倾听到来自民间的娓娓絮语。

我所采访的这些人、这些事，许多都是文献史料略而不计的。他们的回忆，使我们得以从民间的立场反观历史。换句话说，口述虽然只是一种方法，它的兴起，却足以给历史提供更加多元的视角，更加宽广的空间。

对文献的“偏爱”，可以说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本能，不过，对它的局限，我们的理解可能也深一些。我们在跨入史学门槛之初，老师就要讲陈垣老的校书四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就是通过多种校勘方法，察知文献真伪，辨明记载正误。但只是从文献到文献的考辨，还是不够的。通过口述方法，发现并矫正文献记载的缺失，对于

① 在这方面的文章有：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也是口述历史》，载《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定宜庄等《口述与文字，谁能反映历史的真相》，钟少华《口述的历史与历史的口述》，载《光明日报》2002年7月18日；杨祥银《中外口述史学概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7月9日；杨立文《口述历史刍议》，载《纵横》2002年第8期。关于口述历史的规范化要求，可参考〔美〕唐诺·里齐《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王芝芝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7年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口述历史进阶研习营学员手册》，2000年铅印本。可供参考的成果有叶采曼瑛《也是家乡》，三联书店（香港）1994年版；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以文学兼口述的形式，披露了大饥荒年代一段最黑暗最血腥的内幕，尤其值得一读。